由票号衰亡问题引起的思考

洪 葭 管

对于山西票号的兴盛、衰落和终于全行业消亡的原因及经验教训，历来是经济、金融史学界关注的值得探讨的问题。这次“山西票号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又一次引起我对山西票号衰亡问题的再认识和再思考。爰草此文，略抒鄙见。

一、金融业是风险行业

从历史上看，只要是用契约行为进行的货币借贷，均属金融范畴。到了有专门机构从事资金的融通、划拨和资本的借贷、运作时，便产生了金融业。金融业从其产生之日起在经营、运作过程中发生的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风险是不断的。《西欧金融史》作者美国金德尔伯格说，从 16 世纪 50 年代到 19 世纪 80 年代“金融危机通常约 10 年出现一次”[①]。为什么信用风险、金融危机如此频繁地出现呢？原因就是它所从事的行当是在不确定环境下对资金或货币资源进行跨期的配置。正由于是跨期的就容易引起脱节乃至断裂。信用风险的发生不外乎来自三方面：一是违约风险，原来订有借款合同，但借款者到期不能偿还，违约带来了风险；二是市场风险，凡是投资和资本运作，因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随时都会发生；三是货币购买力的风险，包括未预期的突然而来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风险，未预期的通货紧缩带来的风险，以及通胀率高于预期，通缩持续时间长于预期等的风险。这三方面风

[作者简介] 洪葭管，男，1921 年生，浙江人，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①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6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险以多种多样形式出现，直接间接都与金融业有关，因此，可以说金融业是风险行业。

面对金融业经营业务所遇到的信用风险较大，人们就会想出各种各样规避、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的对策、措施和办法。旧中国经营管理较好的“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三家银行，均有一套在正常情况下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二战前后，世界各国金融业还产生一些国际性的共同遵守的防范准则，如资本充足率、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贷款审查和贷款最高限额制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等。回过头来看当年的山西票号，它在体制上和经营机制上有四大缺陷：（1）不实行股份制，缺乏资本积累，盈利几乎全部分光；（2）不吸收小额储蓄存款，不会把小额分散的钱集中起来，不能更多的聚集社会货币资本；（3）贷款不求物质担保，只讲个人信用；（4）不善于把本币和外币协调运用，把金银外汇有重点的有时效的持有和运用。没有这四条，金融业防御风险的能力就大大削弱。山西票号尽管有辉煌的经营业绩，但是缺乏近代金融业防御风险的这些保障，一旦大风暴袭来，或者政局有大的变迁，它就免不了面遇厄运。从这一层面来讲，票号这一行业之被淘汰，固然有强大的外部原因、外部条件，而更重要的乃是它内部缺乏和不具备抵御、化解外来风险袭击的基础力量和基本因素。

二、战争、货币、政治是影响金融业兴衰存亡的三大外部因素

从全部中国近代金融历史的发展演变来看，战争、货币、政治（政策）是影响金融业兴衰存亡的三大外部原因。

20 世纪前半期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对中国金融业发生至深且巨的影响和变化。第一次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蓬勃发展，华商银行、钱庄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颇像经历了一次资本原始积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中国统治者的垄断思想，造成政府金融机构庞大的垄断势力，削弱了乃至摧残了自由发展资本主义银行的力量；同时在蒋介石反动统治 22 年中的一半时间，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法币贬值，使民族资本银行、钱庄拥有的资产实值比战前大大削弱乃至丧失了扶持民族工业发展的力量。

这两次大战对山西票号已经无关。但它在“八国联军”侵入和辛亥革命风暴中受到的战争炮火和政治变革的猛烈冲击，也曾对它造成了巨大创伤乃至致命打击。

庚子之变后，山西票号虽还有过一次恢复性的兴隆，但这终究不过是“回光返照”，内部受损坏程度已经相当可观，勉强支撑了 10 年，到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统治被推翻，民国政府成立，它所有的特权和优势均不存在，就再也支撑不住这一大厦的倾塌。

政治变革对金融业影响如此之大，但为什么性质相似的上海钱庄并没有因此而全面崩垮。这是因为钱庄并不像山西票号那样依附于清朝政府。一方面，票号结纳官吏，与政府关系密切，一旦革命爆发，政府的存款、汇款停止，汇兑协饷等无法再承做，资金来源断绝；而另一方面贷款不能收回，贷款只重个人信用不讲究物质抵押的风险完全暴露出来。既丧失了营业基础，又复遭受巨大的赔累和亏损，等待票号的就只有淘汰和消亡的命运。

再上溯到太平天国时期，因战争阻滞，使各省应解京都的银两银元无法运到北京，清廷才允许票号承汇官款，这实际是为票号带来了新机遇。它由此扩大了营业规模，并由此建立和加深了与政府及官吏的特殊关系，票号又兴盛了数十年。说结纳官吏、与现政权关系密切是它兴盛的原因，也是它终于消亡的根源，是合乎逻辑的推断。

三、金融受决定于经济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该是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马克思是较早评价信用巨大作用的先导者，他在《资本论》中说过：“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以生产方式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① 这一论断是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两者之间关系的关键。

19 世纪下半期是中国经济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时期，强大的外国资本势力侵入和渗透到各个领域。在金融领域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大陆半个世纪之后才有中国资本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在中外金融势力相差悬殊的环境下，钱庄运用自己的信用工具庄票，在为外国商品倾销和收购土特产品出口服务中，开始依附外国资本势力，分到一份利润，并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且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这一金融行业因适合经济的需要而得以保持原来地位。票号不具备这样条件，不适合这一特定经济环境的需要，而被排挤出局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第 686页。

了。

这里需要进一步分析票号这一金融业的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在 19 世纪初，当时市场交易中存在着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矛盾，汇兑是解决这一矛盾，解决支付问题和清算问题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于是由商号改组为专营汇兑的山西票号产生了。在统一的市场形成中，这种在全国重要商埠广设分号以利商品贸易和商业发展的票号自然受到各方面的欢迎，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演变，各种经济关系更趋繁复，受经济决定的金融，愈来愈向综合化和多功能化方向发展演变，那种单纯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便不那么适合需要而难以维持其生存了。

本来，已经有了经营全国性汇兑业务的经验，资本实力相当雄厚，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山西票号是最有条件亦最有可能转变成为现代银行业的。未转变成银行之前的山西票号仍处于货币经营资本阶段。我们知道，货币经营资本或货币商业资本是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须的。作为货币经营业的山西票号以汇款、存款等形式集中相当数量的闲置货币资本，同时它的借贷业务也有了相应的扩大，这正是货币经营业未发展成为现代银行业之前的一种状态。这种货币经营资本正在力图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借贷资本，但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和束缚，它没有能够转化成功，这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四、要用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票号衰亡的原因

对于山西票号衰亡的原因，有的学者强调是由于外部原因，是外部力量把它冲垮的；也有的学者认为票号之所以被淘汰主要是由于内部种种制度的不合理，要从内因上找根源。

原因确有许许多多，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但我们从当时金融业的实际情况来作比较分析，应该看到票号的衰亡既有一般原因即所有金融业均会发生的原因，也有特殊原因或称独特原因即只有在票号身上才会发生作用的原因。

单以辛亥革命这一强烈冲击波对当时中资金融业三种金融势力的影响而言，银行业和钱庄业也受到相当严重的冲击。不论是官营的银行或是民营的银行因此而停业清理的就有 8 家，占 17 家银行的一半；钱庄以上海为例更是成批的收歇或倒闭，业务几乎完全停顿， 1912 年上市的钱庄只有 24 家，不到上一年上市钱庄 51 家的一半。但是风潮过后，它们都能重振旗鼓，不久又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资本主

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它们获得蓬勃发展的势头更是惊人。到 1920 年，全国银行家数超过 100 家，上海钱庄增加到 71 家。就银行钱庄它们也受辛亥革命风暴的严重冲击来说，这是一般原因，而特殊原因则只发生在票号身上，因为它不仅从此一蹶不振，而且最终全行业被淘汰。

学者们似乎单从票号兴衰的理论上找原因，而银行家则从票号与银行钱庄的比较上或对照上看问题。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陈光甫说：“环境变更，思想亦当随之而变，苟执而不变，此之谓不达时务，以前票号之归于淘汰，皆由于此。”又说“清季票号交结官府，声势赫然，一旦革命，即随清政府消灭，其原因何在？盖平时不为商民着想，对社会未有特殊贡献，天演淘汰，势所难免”①。他的话倒是说出了同是金融业之票号归于淘汰有其独特原因即特殊原因。

票号衰亡的根本症结，确是不能跟上时代步伐，不能开拓创新，尤其是没有产生视野超出本行业能够高瞻远瞩看到金融业发展演变前景的人才。李宏龄在民国初年大声疾呼，建议票号实行大联合，组织股份银行，以图生存，不失为有识之士，但即使他的建议成为事实，亦已为时过晚。山西票号欲避免没落，出现“中兴”新局面，倡议办股份制银行并获得成功，时间上应在盛宣怀创办通商银行之前。这也并不是先知先觉，因为洪仁干在《资政新篇》上倡议兴银行，时在 1859 年。以票号的丰富金融实践，相当庞大的资力，遍布全国商埠的分支机构，若能联合起来成立 2—3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成为国人自办银行的首创者，这才是中国金融史新篇章上最光辉的一页。

山西票号业未能自觉地走在时代的前列，而是被银行业所替代，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人们不会低估雷履泰们首创票号的历史意义，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归于淘汰既有其一般原因，更有其特殊原因、独特原因。

① 上海市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5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

孔 祥 毅

[内容摘要] 本文认为山西票号或山西银行，是指包括明清山西商人经营的当铺、钱庄、印局、账局和票号在内的各种金融企业；中国明清时期发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与欧洲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发展的；两个革命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中国白银净流入，中国商品净输出；山西票号为这两个革命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中国却没有很快进入工业社会而且连山西票号也垮台了，其根本原因在于山西票号没有与时俱进的金融制度创新，清政府没有与时俱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创新。

[关键词] 山西票号　商业革命　金融革命　白银贸易　制度创新

The Shanxi draft banks and China's commercial revolu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talks about the Shanxi draft banks which include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pawn shop, Chinese native bank, money changer, money shop, exchange shop, and other various kinds of financial enterpris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and financial revolution of China, which took plac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were developed parallelly with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and

[作者简介] 孔祥毅，男，1941 年生，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辽宁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urope.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 these revolutions is that the silver aboard flow into China and the goods in China export aboard continuously, and the Shanxi draft bank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se. But it is a pity that China had not entered the industrial society and even the shanxi draft banks collapsed quickly.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shanxi draft banks has no financial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also has no soci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times.

[**Key words**] Shanxi draft banks, commercial revolution, financial revolution, silver trade, system innovation

一、山西票号、山西银行

在明清时代，中国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异地贩运贸易十分活跃，已经形成了许多商帮，如山西帮、徽州帮、陕西帮、广东帮、山东帮、洞庭帮、江右帮、宁波帮、龙游帮、福建帮等等，山西帮活动舞台最大，资力最强。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分离出来了货币经营资本，其主要组织形式为当铺、钱庄、印局、账局、票号等金融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以至亚欧其他国家。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当然，在国外有的山西金融机构直接注册名称就叫银行，如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朝鲜挂牌“合盛元银行”。

据 1909 年日本出版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说：“汇票庄俗称票庄，总称是山西银行。据说在一百多年以前业已成立。主要从事中国国内的汇兑交易，执行地方银行的事务。”“原来，山西人在中国人中朴实勤奋，再加上山西有大量的铁和盐等物产，财力丰富，因而在中国各省无一没有山西商人的影子的。这些商人，经常在商业界崭露头角。这就是山西银行的势力形成的原因。”“天津的山西银行，也就是票庄，有下述二十六个字号……”①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在最上层信贷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小镇。山西银行常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在上层和低层之间还有几类大大小小的外国人称为地方银行的钱庄。小钱庄可以

①《山西历史辑览》山西地方志资料丛书之九，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7年。

服务于它们所在地的社区，大的钱庄则常和分布在通都大邑的地方银号有往来。”①

事实上，这些金融机构虽然最初是经营单一的金融业务，比如，当铺经营消费抵押贷款；印局经营短期或临时小额信用贷款，借款还款要盖印；钱庄经营钱币兑换；账局经营贷款业务；票号经营异地款项汇兑业务。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很快也经营了别的金融业务，存、放、汇、兑综合经营，当然还重点保留着各自的传统业务。所以，在广义上，用山西票号或山西银行代表山西商人在明清时代经营的各种金融机构，包括当铺、印局、钱庄、账局、票号等金融企业，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说都是可以的。那么，狭义上的山西票号是指山西商人经营的以异地款项汇兑为主要业务的金融机构。

二、商业革命

在世界历史上，16—18 世纪（明弘治十三年一清嘉庆年间）的 300 多年间，世界贸易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在这个时期，商业扩张，市场扩大，商品关系和商业组织飞速发展，重商主义思想形成并发展，它是 18 世纪工业革命的前奏曲，是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历史上称为商业革命。商业革命的标志，一是国际市场的形成；二是货币金属与商品数量比例变化引起的价格革命；三是企业组织制度的一系列创新；四是适应商品交易扩大和企业扩张的金融革命；五是重商主义的出现。

商业革命是从 13—14 世纪就开始酝酿的，先在中欧及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邦首先发展起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国际贸易路线的转移，欧洲进入了商业革命阶段，直到工业革命及工业社会的产生。中国的一些城市，如长安、开封、并州、杭州等，在唐、宋、元时商业同样很活跃。 15 世纪以后，即明、清时期，北京、广州、平遥、汉口、苏州、杭州等城市商品活动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被经济史学界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实际上也是中国的商业革命，它与欧洲商业革命是平行发展的。这场商业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城市化的发展。一位西方学者在回顾 18 世纪以前几个世纪的情况时，对中国当时的情况，作了一个总结，“中国的经济已经商业化了，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就是经营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如介入垮地区贸易的钱庄、字号和商会的成长，以及地方市场网

① 贵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2 页。

络密度的增加，企业家才干的提高，“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前现代化的最后三个世纪里，涌现出远比以前多得多的私人经济组织；这里既有量变，也有质变。特别是，乡村工业通过愈益细密的市场网络而得以协调，城镇工业通过这个网络而获得原料和顾客并形成大批雇佣工人的新结构。”① 费正清先生说：“中国在 18 世纪，如果不是更早些的话，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任何一个地区的供应品，可以用来满足其他任何地方的需要，……好比说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或者中国商业革命的起步。……中国国内市场的兴起可以从各种专业化的商人群体的成长来衡量，诸如批发商、零售商、走南闯北的行商，上层都还有层层的掮客和代理人，他们为不同地区间的贸易服务。”②

国内外有很多论著对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整个欧洲市场商业的革命性变化讲了很多，而对亚洲方面，比如中国市场的发展，只讲南方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商品经济发展。对中国北方市场的发展及通过陆路对欧洲贸易谈得比较少。其实，中国北方的商品化、城市化发展在明清时期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明代北方的商品化、城市化发展，与明朝北部边防建设有一定联系。当时长城沿线驻军 80余万人，军马 30 多万匹，每年军需物资供应浩繁，政府实行开中法，以食盐贸易特许权，带动了物资北上，推动着农业的商品化。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先生在他的《山西商人研究》一书对此有比较详尽的研究。我在拙文《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研究》也讨论过当时北方商业贸易的情况。据史料记载，明代宣府镇“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庄、苏杭罗缎庄、潞州绸庄、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棉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③ 至于北京，更为可观，据中国人民大学李华教授 1961 年实地考察，“北京的工商业会馆，成立于明中叶的很多。如山西平遥颜料商所建立的颜料会馆……当在明万历以前。……还有山西临汾、襄陵两县油、盐、粮商建立的临襄会馆。山西临汾纸张、干果、颜料、杂货、烟叶等五行商人建立的临汾东馆（亦称临汾乡祠）。山西临汾商人建立的临汾西馆。山西潞安州铜、铁、锡、碳、烟袋诸帮商人建立的潞安会馆。浙江宁波药材商人建立的四明会馆。陕西关中商人建立的关中会馆等。”④

自清康熙初平定葛尔丹叛乱后，经由内外蒙古和新疆的对俄罗斯及欧洲的贸易

①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9 页。
② 贵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8 页。
③ 《宣府镇志》,嘉靖版卷 20。
④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载《历史研究》， 1978 年第 4 期

进一步活跃起来，满洲里、恰克图、塔尔巴哈台都是很重要的市场。比如在恰克图，通过蒙古草原有一条中国通向欧洲的商路，即南方物资经长江、运河的水路到河南的周口、赊旗镇，经过清化一泽州一潞安一子洪口一晋中一太原一雁门关一黄花堰一杀虎口一归化一库伦一恰克图一伊尔库茨克一新西伯利亚一莫斯科一彼得堡。“ 由 1768 年叶卡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以恰克图为主要的（如果不是惟一的）活动中心…… ”，大约在 1845—1847 年以前，平均每年从这里输走茶叶 4 万箱左右， “1852 年却达 175000 箱 ”。此外，还有“ 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属制品、毛皮以及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 1500 万美元以上的巨额 ”，“ 运往恰克图供应 1855 年集市的茶叶不下 112000 箱 ”。“ 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指挥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 900 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来传递公文。 ”①

恰克图市场在 1723 年（清雍正初年），商品交换额大约为 100 万卢布左右，1765 年前后（清乾隆中期）增至 200 万卢布左右，到 1795 年（清乾隆末年）达到 300 万卢布以上，1796—1920 年（清嘉庆年间）增至 600 万卢布以上，清道光咸丰年间持续增加，以 1843 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为例，经山西商人之手，输往恰克图的商品，仅茶叶一项达 12 万箱（每箱 100 磅）。这一年，从俄国输入的商品有：各种毛皮 123 万张，各种毛呢 11000 匹，天鹅绒 117 万张，亚麻布 57 万俄尺，羽纱 2.6 万俄尺。据统计资料，清道光朝是恰克图市场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俄国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40％—60％，19 世纪 40 年代贸易额有时超过 60％；据《中俄贸易之统计的研究》， 1844 年，中国对俄商品输出入分别占全国商品输出入总额的 16％和 19％。对俄贸易仅次于英国，占第二位。②

1821—1850 年，中国方面向俄输出每年约在 800 万卢布上下。俄国对华贸易的差额，是由一种白银的粗制品以“ 工艺品 ”的名义来支付的，因为当时俄国禁止输出白银。而这种粗糙的“ 工艺品 ”大部分是俄国从汉堡或莱茵河上的法兰克福人

①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67 页。

② 参见拙文《山西货币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贡献》，载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6—149 页。

输入的，称为汉堡银，其成色很高，被山西吸收后，铸成元宝银，投入国内金融市场。①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北部边境，政府的管理较松，而在东南沿海，由于海上不靖，所以管理较严，很长时间只许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但是，实际上民间公开的或走私的贸易在当时是无法管住的。

另外，中国商人介入国际贸易有一个特殊的渠道，这就是纳贡贸易。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先生把亚洲历史看作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内部的纳贡关系和纳贡一贸易关系为特征的统一体系的历史”。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西北亚有一种中心一边陲关系……与邻近的印度贸易相联接。”② 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长期保持一种藩属纳贡关系。这种纳贡关系的基础是商业交换。也就是说，纳贡与贸易是相联系的一种共生关系，日本等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长期是靠纳贡使团获得的利润来维持的。同时，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渗透以及海外华商的迁徙，与这种贸易网也是交织在一起的。滨下武志先生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纳贡贸易，还是欧洲国家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中介贸易，从而构成了一个多边的纳贡贸易网，它从这个网之外大量吸收商品。据说，中亚商人经常带着仿造的公文，冒充政治使团去“朝贡”，其实是从事平凡的贸易活动，利玛窦就说过这类事，明朝官方文件也承认这些活动。滨下武志先生认为，纳贡团有一种地理等级：第一层是北方的朝鲜、日本；第二层是东南亚的各个地区；最后是葡萄牙和荷兰。“天朝”是天下的中心。这种中国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西亚、欧洲及欧洲的经济殖民地以及这些地区之间的中心一边陲关系，构成了中国对外的贸易关系。总而言之，整个纳贡与地区间贸易是以中国的纳贡体系为中心，而且它具有自身的结构规则，通过白银的流通而实行着有条不紊的控制，这种涵盖东亚和东南亚的也联结着毗邻贸易区，如印度、伊斯兰地区和欧洲。③

由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商品交易数量的扩大，硬币缺乏，成为世界性问题。中国的银铜平行本位制度，在格雷钦规律的作用下，银贵铜贱，法定 1 两白银等于 1000 枚制钱（1 贯），后来高到一千数百枚制钱才能换 1 两白银。新大陆发现后，美洲白银和黄金被源源运向欧洲和亚洲，硬币增加，引起物价上涨，又出现了价格

①参见拙文《山西货币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贡献》，载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6—149 页。

②转引自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4 页。

③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4—169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革命。

在商业革命中，商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创新。在欧洲，合伙企业、特权公司、特许公司、股份公司相继出现。在中国，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股份制也应运而生。中国的股份制企业还多了一种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合作的股份制形式，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东家，出力者是伙计，东伙共而商之。这也可以称为人力资本股份制（这种制度在西方是最近几年才出现）。

三、金融革命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世界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包括各种票据、商业银行、清算制度、证券市场迅速发展起来，开始出现了近代金融制度，这是商业革命的产物，又是工业革命的准备，可以称为金融革命。

金融革命的背景是商业革命。由于远程贸易的发展，交易量扩大，货币数量不足，引起信用和信用工具需求和发展。信用和信用工具的需求和发展带来近代银行制度的产生和股票债券融资与交易市场的发展。和商业革命一样，金融革命在亚洲和欧洲同时发生。

在欧洲，汇票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但不能贴现，直到 17 世纪初逐步进入流通，才可以作为一种债权进行转让。16 世纪法国政府最早发行债务。 1553 年俄国注册了俄国公司，1600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 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发行股票。这一些已为大家公认。但是，中国在 17—18 世纪的金融革命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的重视。一讲金融的发展历史，言必谈欧美，似乎中国的金融工具、业务、机构都是舶来品，这是很不公正的。甚至有人说“我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发展是从 1978 年开始的”。

事实上，明朝中期，当铺、钱庄已经遍及大江南北，清代又有印局、账局和票号产生。当时中国的各大商帮，大多经营有当铺和钱庄，但是都没有山西商人经营的当铺、钱庄数量多，地域广。早在 1765 年（清乾隆三十年），仅苏州一地就有山西商人经营的钱庄 81 家。① 现在有名的苏州旅游景点“全晋会馆”，就是当年山西货币商人行会所建的会议场所。而且，山西商人经营的印局、账局和票号，却是别的商帮所没有的，特别是遍布全国各地以至国外的分支机构，更是其他商帮所不可

①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95 页。

能的。除了京城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以外，在偏僻的边远地方，都有山西银行。如四川的巴塘、里塘、雅安、打箭炉，西藏的拉萨，云南的昆明、蒙自，海南的琼州，外蒙古的库伦、科布多，新疆的迪化，东北的满洲里、齐齐哈尔；在国外，东边有日本神户、横滨、东京、大阪和朝鲜的仁川，北边有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西边有叶尔羌，南边有新加坡、印度的加尔格答等等。山西货币商人，包括经营当铺、钱庄、印局、账局和票号等金融企业的商人，在明清时期，尤其是在清中叶已经有了很大的金融创新。他们与意大利伦巴第商人创造伦巴第银行业务一样，在中国金融史上曾有过重要的贡献。这种创新对现代金融不仅具有前驱意义，而且对现代金融创新的启示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1912 年 11 月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对山西银行业界的一次演讲中谈道：“英之金钱商，与吾之炉房类，姑且不论。若以意大利自由都府之钱商与吾票号较，则其相类处有四”：一是与商业企业往来不少，但吸收官款存放，并与帝王贵族往来者居多；二是利用各地币制不一平砝的差异，压平擦色，从中渔利；三是出票慎重，信用卓著；四是同时发生在 17 世纪以前，时代背景相同。

山西银行的金融工具创新。在中国， 9 世纪（唐后期）使用汇票。明末清初，票据有以下几种： （1） 凭帖——本票；（2） 兑帖——本铺出票兑现； （3） 上帖——当铺钱庄之间相互协议兑现； （4） 壶瓶帖——不兑现支票；（5） 上票——非钱庄出的凭帖，信用较差； （6） 期帖——远期期票，以赚利息。凭贴、兑贴、上贴、上票、壶瓶贴和期贴这六种信用流通工具，在清中期已在中国北方普遍行使。前三种是见票即付现款，如同现金；后三种不一定立即付款，易生纠葛，清道光皇帝曾下令准许行使前三种，禁止行使后三种，事实上禁而不止。对于筹集长期资金的股票债券市场的信用工具，意大利在 15 世纪出现过可转让股票的合伙组织，后在英国等地传播，但直到 17 世纪这类股票还是海上冒险之后还本付息。 17 世纪中期，真正的股份公司才正式发行不兑现的股票，并可以到交易所去买卖。 18 世纪中期在中国也有了股票的发行与交易。 1883 年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金融危机，其导火线与其说是胡雪严的生丝投机，不如说是外商炒作开平煤矿股票。①

山西银行的金融机构创新。山西商人创立了从事消费信用机构——当铺；创立了对贫民放印子钱的印局（一般按日或者按月计息，每归还一次，盖一次印，故名

①见拙文《亚洲金融危机是不是亚洲奇迹的终结》，载吕春成：《经济一体化的延伸与超越》，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 页。

印子钱）；创造了专门办理放贷取息的信用机构账局；创造了专门从事钱银兑换业务的钱庄；创造了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汇兑庄——票号。随着金融交易的发展，这些从事单一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相互学习，走上了存款、放款、兑换、汇款等业务的综合经营。如果说从事存款、放款、兑换、汇款的机构是银行业，那么我们可以列出早期的主要银行机构。

1069 年潞州交子务成立，河东路流通。

1151 年金发行交钞。1160 年户部发行会子。

1173 年金设立流泉（政府公典）。

18 世纪初清康熙中年，大盛魁印票庄开张。

1731 年北京设立官钱局。

1736 年（清乾隆元年）张家口设祥发永账局。

1737 年北京开设官钱局 10 所，以平钱价。

这些金融机构，比 1408 年（明永乐六年）在热那亚成立圣乔治亚金库、1609 年（明万历三十七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并不晚。到 1853 年，仅北京城的账局就有 268 家，其中山西商人经营账局的就有 210 家。

山西银行的金融业务创新。他们创造了转账结算、票据贴现、旅行支票、银行轧差清算、货币交易市场、银行密押等等。下面列举几例。

据《绥远通志稿》记载：在内蒙古地区的商品交易，“在有清一代，在现款凭贴而外，大宗过付，在拨兑一法。……拨兑之设，殆在商务繁盛之初，兼以地居边塞之故，交易虽大，而现银缺少，为事实之救济及便利计，乃由各商转账，借资周转。历年既久，遂成金融不易之规，且代货币而居重要地位”。拨兑之外，还有谱银，“商市周行谱银，由来已久，盖与拨兑之源流同。其初以汉人来此经商至清中叶渐臻繁盛，初仅以货易货，继则加用银两，代替货币，但以边地银少用巨，乃因利乘便，规定谱银，各商经钱行往来拨账，借资周转，此谱银之所勃兴也。虽其作用类似货币，而无实质，然各商使无相当价值之货物，以为抵备，则钱行自不预互相转账，其交易即不能成立。……拨兑行使情状，亦与谱银相类，所不同者，仅为代表制钱而已”。所以当时银两转账为谱拨银，铜制钱转账为拨兑钱。但不要忘记，内蒙古呼和浩特银钱商人，基本由晋商垄断，其转账结算办法，《绥远通志稿》讲“悉照内地习惯”。可见内地转账办法要早于呼和浩特市场。

银行同业的短期资金交易市场，起源于何时，史料说明，最迟清代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还是《绥远通志稿》说，当时呼和浩特“向例”在市口交易。“每日清晨

钱行商贩，集合于指定地点，不论以钱易银，以银易钱，均系现行市，逐日报告官厅备查，各钱行抽收牙佣，均遵章领有部颁牙帖、邀帖，……谓之钱市”。“为便利计，故有钱市之设，按市面之需要定银分及汇水之价格，自昔至今，一仍旧贯。”在这种钱市上融通短期资金的“银钱业商人，以山西祁（县）、太（谷）帮为最，忻（州）帮次之，代（州）帮及（大）同帮又次之，故其一切组织，亦仿内地习惯办理”。这种银钱交易市场，也是山西货币商人的创造。

山西票号汇兑，其汇票有见票即付，还有见票过几日再付两种。如果汇票已到，按汇款时商定的兑付时间未到，则不能提款，如果要提前支取，需交纳一定的费用，即如今的期票贴现。这一制度的运用，为工商企业提供了方便，为金融企业提供了生利门径，可见票据贴现在中国发生较早，不过发展并不太快。

清代顾客外出旅行，假设由重庆至上海办货，可将一定数额的旅费，如将1000 两白银交给票号重庆分号，重庆分号开出一张汇票，当即途中经过汉口、南京，需要提取部分现银，到上海后全部提出使用，重庆分号即通知汉口、南京分号（或联号），说明汇款人（亦即提款人）的姓名，待汇款人到汉口后，可到指定分号提款若干，汉口分庄在提款人手执汇票上记录提款若干，下余若干。到南京亦如此，直到上海提毕，由上海分号收回汇票。这种办法，如同现在的旅行支票或信用卡。足见当时山西货币商人的信誉和服务技术之水平。

山西货币商人在明清时期发展了唐代“飞钱”，创设专营异地汇兑的金融机构汇兑庄，他们在自己的营业中，为了减少现银运送，也扩大存款贷款业务，对已经建立来的汇兑制度不段创新，采用了逆汇办法，减少现银异地调拨，节约了大量的流通费用。据《东方杂志》 1917 年第 14 卷记载：“倒汇：中国此种汇兑，向所未有，至近年与外国通商，关系密切，内地市场间之贸易随之而盛，汇兑之种类不得不因之变化。……倒汇之手续亦别无烦累，……有信用之商人立一汇票，交于票号，票号即买取之，送交收兑地之支店，索取现金。”顺汇和逆汇之区别在于，顺汇是甲地分号收款，乙地分号付款。逆汇则是存放汇联系，如乙地分号先收款，甲地分号后付款，是汇兑与贷款结合。如乙地分号先付款，甲地分号后付款，是汇兑与存款结合。此种逆汇，不仅收取手续费，还计利息。这样，一是满足了商人异地采购急需款项的需求；二是减少了票号资金闲置，增加了利息收入；三是减少了异地现银运送，被称作“酌盈济虚，抽疲转快”。

山西票号“汇通天下”。但是，各地分支机构相互之间在一定时间之后总会发生汇差，我欠人，人欠我。如何处理汇差？当时是“月清年结”两种账，由分号向

总号报账均以“收汇”和“交汇”两项分列，既有细数，又有合计，均按与各分号和总号业务清列。总号收到报来的清账，核对无误后，将月清收汇和交汇差额分别记入各分号与总号的往来账，收大于交，差额为分号收存总号款项数；交大于收，差额为总号短欠分款项数，互不计息，因全号实行统一核算。这种办法是现代银行清算相互轧差办法之源。

山西银行的金融管理制度创新。山西银行创造了金融企业管理的两权分离制度、人力资本股份制度、资本充足率制度、防范金融风险的风险基金制度等等。

想经营金融企业的财东，“将资本交付于管事人（大掌柜）一人，而管事于营业上一切事项，如何办理，财东均不闻问，既不预定方针于事前，又不施其监督于事后”，就可以等待到期分红了，“此项实为东方特异之点”①.

山西商人创造了人力资本股制度，将职工人力作为资本而顶股，与货币资本股一起参与分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东家，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商之，有不少晋商企业后期人力资本股超过了货币资本股，职工成了企业主人。

山西银行为了保证资本充足率，有倍股、厚成和公座厚利的规定。倍股是在账期分红后，按股东股份比例，提交一部分红利，留在企业参加周转使用，以扩大经营中的流动资本；厚成即在年终结算时，将应收账款、现存资产乘以一定折扣，使企业实际资产超过账面资产；公座厚利是在账期分红时，在财东银股和职工身股未分配之前先提取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公座”，以便“厚利”。这些办法，都是为在资本经营中尽可能扩大流动资本，保证资本充足率。

银行资本在经营活动中常常会遇到各种不同风险，发生亏赔倒账问题，这不仅会影响银行利润，甚至还会危及资本安全。为了防御风险，票号设计了一种“预提倒款”以防御风险的办法，也叫“预提护本”。要求在账期分红时，不能只顾分红，不管未来有无风险，规定从利润中预提款项，“撇除疲账”，以防止“空底”，设置经营安全防线，把风险减少至最低点。

为了异地汇款所用汇票的真实而不发生假票伪票冒领款项，票号使用只能在总号统一印制有暗记的“会票”，内加“水印”，如日升昌票号汇票水印为“日升昌”字，蔚泰厚票号汇票水印为“蔚泰厚”；书写汇票，专人书写预留备案，各号收到汇票，与预留字迹核对无误，方可付款；汇票需要加盖印鉴，印鉴正中多为财神像，周围用蝇头小字刻写古文；汇款金额、时间，均设有暗号，汇款人、持票人是

①《中外经济周刊》 1925 年 7 月 4 日

无法知道的，只有票号内部专人才能辨别真假，暗号编成歌诀，如 12 个月暗号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一个月 30 日号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必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 1 至 10 的数码暗号为：“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万、仟、百、两暗号为：“国宝流通”。例如，“三月五日伍仟两”即写“假薄璧宝通”。

山西银行业对中央银行制度的创新。明清时代大批在全国各地以至国外从事金融业务的金融企业，为了行业协调和管理，他们自发地创造了同业行会，而且发展到能够管理、监督、约束以及仲裁同行纠纷的组织，如包头有裕丰社，归化城（呼和浩特）有宝丰社，大同有恒丰社。《绥远通志稿》记载：“清代归化城商贾有十二行，相传由都统丹津从山西北京招致而来，成立市面商业。 …… 其时市面现银现钱充实流通，不穷于用，银钱两业遂占全市之重心，而操其计盈，总握其权，为百业周转之枢纽者，厥为宝丰社。社之组设起于何时，今无可考，在有清一代始终为商业金融之总汇。”“社内执事，统称总领，各钱商轮流担任。”由于钱市活跃，转账结算通行，宝丰社作为钱业之行会，“大有辅佐各商之力。”“行商坐贾皆与之有密切关系，而不可须臾离者也。平日行市松紧，各商号毫无把握，遇有银钱涨落，宝丰社具有独霸行市之权。”宝丰社可以组织钱商，商定市场规程，监督执行，如收缴沙钱，销毁不足价货币铸成铜碑，昭示商民不得以不足价货币行使市面，确保商民利益等，尽管没有垄断货币发行，代理财政款项收解，但它有类似“银行的银行”和管理金融行政的职能，可以说是中国早期中央银行制度的雏形。

四、山西银行与白银贸易

在这场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中，山西银行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推动了白银贸易的发展，使中国普通商品大量出口，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商品化、货币化、国际化。

为了说明问题，下面简要谈谈白银货币的流向流量。

1. 从美洲流到欧洲。 1500—1650 年从美洲合法运到西班牙黄金 181 吨。走私更多。1500—1650 年从美洲合法运到西班牙白银 16886 吨。

2. 从欧洲流向近东和远东。欧洲与印度、中东的贸易是入超，欧洲人用白银来支付。西班牙 16 世纪 80 年代在远东净流出 100 万西班牙达克； 16 世纪 90 年代为每年 150 万达克；英国 1601—1624 年东印度公司向远东流出的白银在 75 万英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